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国际问题研究中的
文化与翻译

赵念渝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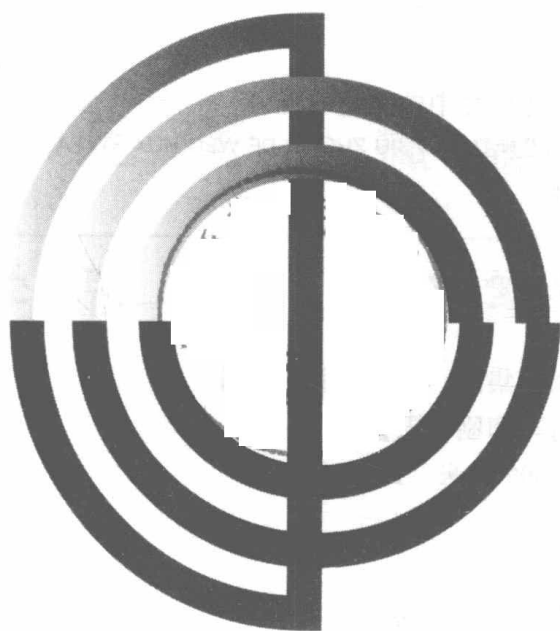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赵念渝 著

国际问题研究中的 文化与翻译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文化与翻译 / 赵念渝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8.8

ISBN 978 - 7 - 221 - 14727 - 1

I. ①国… II. ①赵… III. ①国际问题 - 文集②翻译
- 文集 IV. ①D815 - 53②H05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0000 号

书 名 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文化与翻译
GUO JI WEN TI YAN JIU ZHONG DE WEN HUA YU FAN YI
著 者 赵念渝

责任编辑 周于飞 王 璐
装帧设计 高玉荣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600 千字
印 张 42.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14727 - 1
定 价 98.00 元

千 里 之 行 ， 始 于 足 下
万 丈 高 楼 ， 起 步 砖 瓦
鸿 篇 巨 著 ， 撇 捺 点 划
小 学 昏 昏 ， 大 学 必 假

序

杨 剑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外国著作的翻译起到了促进中国教育、科技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作用。新中国的外语教育发展过程与几个价值取向紧密相关,一是“防范”,二是“开放”,三是“全球化”。在防范作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年代,学习外语是掌握国际斗争的工具,防范外来敌人的军事入侵和文化入侵;在开放的大潮中,学习外语是借鉴国外经验,与国际接轨的有效路径;在全球化时代,学习外语则成为将贡献中国智慧影响世界的有效载体。中国到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说,“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在中国未来发展的进程中,外语学习和翻译的作用将不断得到丰富。

翻译是跨文化的一种信息交流,它促进了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人群之间的借鉴与学习,也是一种文明的分享。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著作的翻译不仅仅是将其他文明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介绍给本国读者,或者将本国作者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而且也会将形成这种看法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一起传播出去。

记得著名的语言学家尤金·A·奈达曾说过,翻译的本质是文化代

码的互换,是在读者接受的语言中寻找和原著语言信息最接近和最自然的对等话语。语言翻译讲究“信,达,雅”,完全对等很难。文化差异是个有趣的现象,这使得翻译本身就包含着文明对话的意义。众所周知,英文中的“safety”和“security”,对应中文都被翻译成“安全”一词,生产安全和国家安全都被称作安全。这两个英文词汇的中文含义的混淆至今还困扰着中国的战略安全学者。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文的安全一词是由“安”、“全”二字叠加而成。在中国的文化中,“安”意为和平、安定,“全”则意味着共同和全体。而英文“security”更强调“消除不确定性”,强调通过建立自身优势压制对手,让对手不能选择冒犯,进而让自身处于无虞的状态。中文的安全二字中已经包含了综合的大家共享的和平与安定之意。而英文的“security”则强调着遏制与消除的意涵。相应之下,中国语境下的安全比英文中的“security”在讨论世界安全问题上则更具包容性,更有文明的高度,更符合实现世界和平的方向。可见中文的“安全”二字,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找到最恰当的语言符号好好地翻译给英语文化背景下的读者。

横看成岭侧成峰。因为文化价值多元,也因为利益各异,不同国家的人们对同一个国际问题的看法常常大相径庭,这也给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著作的翻译增加了难度。在两种语言中寻找信息最接近和最自然的话语并非易事。国际关系中一些概念的提出,往往本身就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部分,也反映了当时国际关系的实力对比和相互依赖关系。当年美国提出了对华的“engagement”战略,这是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处理异类的战略。正面意义是保持接触而不是直接遏制。如果按照当时美国官方文件以及政策形成时的各种讨论去找一个与原著语言信息最接近的对等话语,恐怕是“规并战略”,即以接触的方式规范战略对手的行为使之并入到循规蹈矩者的行列。但是从中国一方面讲,美国的遏制战略和 engagement 战略二者之间,当然是两害取其轻,规并总比遏制好,聪明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将战略的方式——“接触”翻出,而将

战略的目的——“规并”略去。这个翻译在当时的确帮助复杂的中美关系保持了基本面的稳定。

中国数十年持续的发展,引起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战略上的焦虑感。在进一步延长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总体思路下,中国的智库提出了“和平崛起理论”(peaceful rising)。崛起,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但中国的战略家们希望世界能够相信,特别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能够相信,中国的崛起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中国的发展只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拆掉了旧房子盖起了新房子而已。然而在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战略界的互动中发现,对方似乎并不乐意接受和平崛起 peaceful rising。问题不在和平这个词上,而是因为崛起。rising 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界的语境中,是不满足现状国家的行动的概括。这不仅仅是一个单词的翻译,而是一个理论体系中的行为体的特指。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一个霸权稳定论,其基本含义是,只有在霸权存在的情况下,一种特殊类型的国际经济秩序才能繁荣和充分发展。霸权国家是要提供公共产品的,而通过搭便车获益的主要国家,也就是崛起国家往往会对霸权的现实不满。崛起就意味着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和挑战。而霸权稳定论还有一个更长的历史渊源。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古希腊文明。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过一本帮助西方学者形成价值和逻辑判断的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逻辑被称作“修昔底德陷阱”。正如大家所知的那样,中国战略界最后使用了“和平发展”而没有使用“和平崛起”一词。

赵念渝老师是我的同事,他的这本《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文化与翻译》是他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结果,也是他给研究生上国际问题资料翻译这门课的精华积累。赵念渝老师的著作提醒我们,翻译工作必须有对学术的执着,对原著者和读者的良心,切不可望文生义,潦草从事。翻

译的过程就是在和原著者的心灵对话,这种心灵感应越深刻,理解就越透彻,在选择本国语言加以翻译的时候就越容易找到恰如其分的词汇来互换。赵念渝老师如今把这些多年的经验和心血总结汇册,相信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启示。

是为序。

(2018年4月18日于上海田林路)

(作序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自序

智能翻译,工匠精神与瑞士钟表

这是一本有关国际问题理论专著译本的校读以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教案读本,涉及的问题是翻译,但也不仅仅是翻译,故,特此作序说明。

在当今的学术界,说起翻译,尤其是学术翻译,可以说是没有人认为是不重要的,但也鲜有人愿意从事这一工作,理由很现实,一是没有学术地位,学术界只认同考绩评职不可或缺的论文,对任何翻译形式的研究都持排斥态度;二是互联网时代翻译软件满天飞,下载一个软件,分分钟就能搞定;三是社会浮躁,有几个人能老僧坐定般地专注于这一既枯燥又无效益的学术性工作呢?社会太现实,学术翻译“获得感”相当低;辅助工具层出不穷,学术惰性陡增;个别出版部门 GDP 至上。据此,本着趋利避害、人往利益走的本能,学术专著的翻译只能靠边。于是,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与崛起大国很难说相称的奇特现象:经济总量日益提升,专著翻译质量下降,长袖者善舞,用心功课者锐减,个别专家提供的学术专著的译本质量实在不敢恭维。

套话不必多说,本序言就当今翻译领域面临的三个问题探讨: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正在兴起的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翻译工作是否同样需要工匠精神?学术界又该如何看待和处理翻译的学术地位问题?这三个问题非常现实,本专著从一个方面,即用具体案例的分析和解读,对上述三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供有兴趣者参考。

第一,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应该指出的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理论专著的翻译是绝对“吃力不讨好”的事。第一,从学术层面来说,这是非常“吃力”的工作,从专业到非专业,从源语言到目的语,一本学术专著就相当于一本百科知识,源语言作者丰富的阅历、知识、理论乃至语言的表述,对译者来说,若无充分的专业和理论以及语言的准备,要最大限度地转换专著作者的理念与本意,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第二,从技术层面来说,这是“不讨好”的工作,因为人类文明在历经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黑暗时代、启蒙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之后,从20世纪中叶开始,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进入信息时代意味着人类获取信息的速度已经突破了原先的时空概念,进入智能时代则意味着人类转换信息的手段突破了原先的手工操作,进入了智能化操作的新阶段。

据此,因为“吃力不讨好”,人们的普遍心理期待就是能有个什么“不吃力又讨好”的玩意来顶替,智能翻译软件在互联网时代就成了应运而生的天然合理的产物,不少人,包括笔者在内,当然乐观地期待着智能翻译将一劳永逸地取代人工翻译,早在人类刚刚进入21世纪的2000年,美国《新闻周刊》在列举未来100年中行将消失的职业中就列入的“翻译”这一行业。从21世纪头十年的情况来看,机器翻译的趋势日益加强,笔者就多次看到运用翻译软件进行语言转换的目的语文件,其转换速度之快,史无前例,令人匪夷所思。

时至今日,毋庸讳言,不少译者对翻译软件顶礼膜拜,机器翻译正在变本加厉取代人工翻译,并且,随着智能技术的日益更新发展,软件编程设计的日趋完美,这已经成为一种定论。平心而言,如果真能有这么一天,应该说是好事,毕竟,它将学者从无穷无尽的话语转换中解放出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大大的奇迹。

但,凡事皆有两面,智能翻译的错误和谬误,同样是令人匪夷所思、史无前例的(比如许多景区、餐馆等中英文介绍)。这就说明,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用智能翻译来取代人工翻译,不排除可望可及,但破绽累

累,虽然这可能是“成长的烦恼”。

以下就是利用谷歌和微软最新的翻译软件做的几个案例,很有意思:

案例一:

(原文) and how formal legal systems, dependent on a kind of third-party enforcement that does not exist in traditional Melanesia, first made their appearance. (选自《政治秩序的起源》,原著第 xiii 页)

【智能翻译 1】而依赖传统美拉尼西亚不存在的第三方执法的正式法律制度首先出现。

【智能翻译 2】以及如何正式的法律系统,依赖于一种传统的美拉尼西亚中,不存在的第三方执行第一次亮相。

【人工翻译】正规的法律制度,如美拉尼西亚社会从没见过第三方执法,又是如何问世的。

案例二:

(原文) Liberal democracy is more than majority voting in elections; (选自《政治秩序的起源》,原著第 4 页)

【智能翻译 1】自由民主在选举中多数投票。

【智能翻译 2】自由民主是更多比多数投票选举。

【人工翻译】自由的民主不仅仅在于(动员)大多数人出来投票选举。

案例三:

As the Roman republic was disintegrating, not all of its citizens quietly acquiesced in the loss of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In Shakespeare's famous version of the politics of those days, one citizen, Cassius, asks Brutus, "Upon what meat doth this our Caesar feed that he is grown so great?" In a sense this book is an attempt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in the context of an American imperium. To start, consider just one proposition on which today's imperialists—poisoned by false pride and self-glorifying assumptions—have fattened. I am referring to the dangerously misleading conclus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used the Soviet Union's collapse and therefore "won" the Cold War. The mind-set that produced this conclusion offers clues to how the United States, like ancient Rome, embarked on the path toward militarism and empire. (选自《帝国的悲哀》,原著第一章第4自然段)

【智能翻译1】由于罗马共和国正在瓦解,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悄悄地默认失去民主权利。在莎士比亚这个时代的政治著名版本中,一个公民卡肖斯向布鲁特斯问:“我们的恺撒饲料是什么肉,他长得如此之大?”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美国皇室的背景。首先,只考虑今天的帝国主义者——以虚假的自豪和自我荣耀的假设中毒的一个命题——已经肥胖了。我指的是美国造成苏联崩溃的危险的误导性结论,因此“赢得了”冷战。产生这个结论的心态提供了一些线索,说明像古罗马这样的美国如何走上军国主义和帝国的道路。

【智能翻译2】随着罗马共和国崩解,并不是所有其公民静静地默许了他们民主权利的丧失。在莎士比亚的著名版本中政治的那些日子里,一名公民,卡修斯,问布鲁特斯,“后什么肉岂这我们恺撒饲料,他变得如此强大?”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帝国的尝试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美国。若要开始,请考虑肥今天的帝国主义者——虚假的自豪感和扬眉吐气的假设——被毒害了的只是一个命题。我指的危险的误导性的结论,美国是导致苏联的解体,因此“赢得了”冷战。产生这一结论的心态提供线索如何美国像古罗马时代,着手走向军国主义和帝国的道路。

【人工翻译】当年罗马共和国走向瓦解时,并非所有的公民都一声不吭地默认了自己民主权利的丧失。在莎士比亚(剧作中)有关当年政治的对白中,公民卡修斯就曾这样问过布鲁图:“我们的恺撒究竟是吃了什么东西才变得如此厉害?”在某种意义上,本书的目的也就是在英利坚帝国的语境下努力对上述问题作个回复。首先,考虑一个论断,今天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因为虚荣和自命不凡假想的毒害——就是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膨胀起来的。我这里指的就是下列论断,即:美国导致了苏联的垮台,从而“赢得”了冷战,这一论断是危险的,也是误导性

的。导致这一论断的思维定式的潜台词(**clues**)就是暗示美国同古罗马一样,走上了黩武之路、帝国之路。

不作比较解读了,凡是懂英语的,都应该看得清楚。笔者谨此就智能翻译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欢迎指正。

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智能翻译。不可否认,智能翻译的出现使人工翻译在速度上已经相形见绌,智能翻译分分秒秒可将源语言文字转换成目的语文字,智能计算速度之快,信息处理效率之高,前所未有的。很自然,人工智能取代人类、人工智能“终结者”、人类一个晚上就跨入梦寐以求的智能世界,各种前景众说纷纭。据说,任何非智能的工作不但已经被打上“低端”的烙印,而且注定在不久的将来将被淘汰出局。

这听来是挺恐怖的,也似乎是挺有那么一回事的。

只是,借用当今的流行语,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比如,在经过几番的论证与考量后,中国最近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最终被译为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而不是 shared destiny;“新型大国关系”被译为 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而不是 relations between big powers。

这是为什么?

如果智能翻译能回答这样的问题,那就不是人工翻译被淘汰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都可以被淘汰了!

“翻译”是人类信息文明的传播手段,也是一切人工智能的驱动力。简言之,翻译背后是语言,语言的本质是符号,符号是对信息的编码。翻译就是符号的“编码”和“解码”。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就是对一种编码进行解码,再重新编码为另一套体系,或者说,就是将一组符号转换成另一组符号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确定这两组符号共同意义的唯一标准就是它们通过各自的源代码传递了彼此相似度最高、不会引起误读误解的信息,这样的符号转换会被认定是有意义的,据此,编程行业有个著名的 GIGO 原则,即 Garbage In Garbage Out(无用输

入,无用输出)。这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道理,任何“智能”皆是“人工”所提供,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人工”的话,全部“智能”只能归零,而当下一一些对“人工智能”的溢美之词恰恰都忘记了这个根本,把在大厅里同观众对话的机器人当作了自主性物种。

话说回来,智能翻译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在一瞬间通过无数的排列组合将从编程者输入的全部信息中遴选出两组意义最相近的符号并予以合理的等量转换,在当今信息化时代,通过超级计算机,这已经完全可以做到。而且,相比之下,就速度而言,传统的人工翻译确实已经是穷途末路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必须承认。

但,人和智能机器的最根本的差别就是:人的思维是有机的,机器的思维是无机的。机器可以在一秒钟之内进行上亿次的计算,但这些计算全是数量级别的。人的大脑也许一秒钟只能进行一次计算,但这一次的計算就是几何级别的,这是任何智能翻译机器无法达到的级别。如果(这是个极其恐怖的“如果”)智能翻译机器哪怕能做到半次这样的有机思维,人类的末日就指日可待了。只是,这是一个“如果”,而且是一个永远的“如果”!

但这并不妨碍人类可以利用智能翻译的长处不断优化解码和编码的质量,最小化符号转换过程所产生的信息差,这是智能翻译做不到。

比如,近来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松下问童子”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这是唐代“推敲”大师贾岛《寻隐者不遇》的诗句: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台湾有好事者输入智能翻译软件,结果跳出来的第一句就是:Panasonic asked the boy(松下问童子)。此事一上网,网络上顿时欢呼雀跃,网友们脑洞大开。其实,软件并没错,软件是非常忠诚地执行了数据库提供的指令,因为制作这一软件的日本程序员输入的“松下”就是日本企业的名称,所以智能翻译就是根据这一指令将“松下”准确无误地转换成日本企业的名称,这是等量转换。如果(又是一个恐怖的“如果”)翻译软件能解读此句三昧,抛弃程序员输入的指令、独立自主地识别这是中国古诗人贾岛的名句,将“松

下”自主等值地转换成“松树之下”的话，这不但是骇人听闻，简直就是毛骨悚然了！

可见，翻译不仅仅就是简单的符号转换，上述案例再次帮助笔者证明了自从智能翻译问世以来就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翻译需要温度、广度和深度。这三个“度”本质上就是人工翻译和智能翻译的一个不可跨越的障碍，智能翻译一旦能成功地跨越这一障碍，那就是人类的末日。这三个“度”就是人类才拥有的、迄今为止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想象力，创新思维和交流沟通能力。这是无须展开说明的。人工智能能想象出人工智能吗？人工智能能创造人工智能吗？人工智能能上台同任何人进行问答交流吗？但如果突然有那么一天，人工智能居然能独立自主地同问话者眉目传情、无语凝噎、蓦然回首、风情万种或者怒目相视，不消说，对话者不是当场吓死，也必然被吓得半死！

人类对两个世界是永远做不到透彻了解的，这就是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人类发明了航天飞机卫星射电望远镜天目甚至可以将数千吨重量的玩意送上太空轨道，但是你对地球外的宇宙的了解呢？微乎其微！人类还知道了这个装在我们天灵盖里面的被称之为“大脑”的玩意是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组成的器官，但你对这些细胞究竟了解多少呢？也是微乎其微！人类对这些细胞的功能几乎一无所知，更不要说模仿制造，这是天方夜谭。可见人类的想象力、思维、情感的运行机制到目前仅仅是被有限的科学手段掀开了冰山的一角。如果说人对自己的了解只不过是仅此而已的话，那么，你又怎么能指望人工智能超越自身并反超人类呢？有人指出：“人能创造机器人，但是机器人永远都创造不了人。就凭这一点，机器人就无法取代人类。”重要的话说三遍，如果哪天机器人能取代人类，那么，人类就失去了全部的存在意义。

所以，话得说回来，人工智能的出现是值得庆贺的科技进步，但再伟大的科技进步也无法超越创造这一进步的人类，智能翻译同样如此。

据此，笔者的观点是：平心而论，人工翻译和智能翻译的关系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因为人工翻译的不可取代性而将智能翻译

贬入另册,这是偏见;因为智能翻译的速度而断言人工翻译出局,这是无知。实事求是地说,人工翻译是根本,智能翻译是人工翻译的补充和帮手,人工和智能翻译完全能相互默契携手合作互补,并不存在哪个淘汰哪个的问题。人工智能本来就是人发明的玩意,取之于人,用之于人,人工智能的初衷和发展方向本来就应该就是这样,怎么能断言智能翻译将来一定能取代人工翻译呢?恰恰相反,智能翻译的出现完全可以帮助人类极大地完善这一工作,机械的智能翻译加上有温度的人工翻译,这应该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不是零和游戏。

结论:就人文社会科学专著的翻译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智能翻译恐怕还是只能进行粗糙的字句对应转换,无法进行人类对文字语言阅读意义上的转换,更无法进行深层次文化意义上的转换,“高能低智”可能是智能翻译软件一个致命的、难以突破的技术,如突破,那将是全球的灾难,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最后,提供贾岛《寻隐者不遇》的人工翻译和智能翻译的互联网文本,供有兴趣者玩味。

原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人工翻译:

Under the pine tree I asked the lad, where his master had gone.

“To pick medicinal herbs, he said he had gone.”

“He’s simply in this very mountain out,

In the depths of clouds, his whereabouts are not known.”

智能翻译:

Panasonic Q Boy,

made by the division herbs to go.

Only in this mountain,

I do not know at Yunshen!

这不是很有趣的比较吗?

第二,翻译是否需要工匠精神?这是明知故问,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工匠精神,不论你是否从事翻译工作,只要是做学问的,都不会对这个问题给予否定的答案,并且会很逻辑很雄辩地提出若干见解和建议,泛泛而谈,一二三四,太多了。

但理论很丰富,现实更骨感。说归说,做归做,说易行难,牛皮哄哄,现在是说得比唱得还要好听。平心而言,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非常实在、非常踏实的实干精神,不管哪一行,实干就是工匠精神,不在于说,而在于做。那么,怎么做呢?我们不妨看看下面两个案例:

这是从《帝国的悲哀》的“引言”部分摘录的一个校读的案例,为了原著中提及的一个缩写专用名 SMERSH,做了大量的引证工作,最后建议该缩写的专用名可考虑为“军事反间谍特别行动局”,而并非是译者所称之为的“克格勃第九局”:

(原文)No doubt he envied Dr. No and the head of SMERSH, both of whom had private, semimilitary forces at their disposal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ed. (原著第 11 页)

(译文)毫无疑问他嫉妒不博士和克格勃第九局的首脑,这两个人都有一只私人的半军事化部队,听候命令去做两人想做的事。(译著第 11 页)

【关于“不博士”:就是“诺博士”,007 系列片之一:“不博士”(或“诺博士”)是伊安·弗莱明小说中的虚构人物。】

【关于 SMERSH,中文音译为:施密尔舒。

译著提供译文为“克格勃第九局”:经查,克格勃共设 16 个局以及边防军总局和侦察技术局,关于第九局是这样介绍的:第九局担负保卫职能,它负责保障国家高级领导人、国家最高规格的礼仪场合、外国代表团来访和苏联代表团出访的安全。这一介绍显然同译文中解读的 SMERSH(克格勃第九局)有距离。

SMERSH 在小说中是个虚构的组织,但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有这个组织的各种影子,只是它不是隶属于克格勃的一个组织。经查,从维